

# 中國當代水利志修纂的興起

## ——以河西走廊為例

●張景平、陳智威

**摘要：**1980年代，水利志修纂在中國蔚然成風，為後來研治水利史學者保存了一批數量龐大的歷史文本。本文以甘肅省河西走廊1980年代修纂的各級水利志為研究對象，指出當代中國水利志修纂係政府推動下地方志修纂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自上而下推動、自下而上完成」為顯著特徵，規模前所未有的，但在組織方式、人員構成、編寫流程等方面深具行業特點與時代特色，修志活動本身構成二十世紀中國水利史研究上的重要事件。這些水利志雖然存在明顯的時代烙印乃至不足，但對傳統水利進行了總結、對現代水利的展開過程進行了提煉，其獨特的文獻價值不可替代，水利史研究者需要予以充分重視。

**關鍵詞：**甘肅 河西走廊 水利志 江河志 現代水利

### 一 引言

研究中國治水歷史者，於文獻資料無不格外重視地方志。地方志修纂活動自宋元漸次普及，皆注意記錄水利事業之種種情形；其中記錄較詳者，往往單獨析出，成為獨立之水利志。如清初陳儀所撰《直隸河渠志》，實為其修撰《畿輔通志》中之〈河渠志〉，獨立成書後被收入《四庫全書》，影響力明顯擴大<sup>①</sup>。除《直隸河渠志》以外，清代僅直隸一地，即有乾隆、嘉慶、光緒《永定河志》，嘉慶《畿輔安瀾志》，光緒《畿輔河渠志》等數種水利志。這些志書的修纂活動，深深嵌入到歷代極為活躍的治水事務中，折射出時代政治與思想的種種光譜。如《永定河志》的修纂即有記錄京城治水成績的直接意圖，得到

\*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明清以來河西走廊水利文獻集成整理與研究」(22&ZD 225)階段性成果。

清帝的認可<sup>②</sup>；而《畿輔安瀾志》自問世不久即掀起一段長達百年的公案，這段公案主要圍繞乾隆《直隸河渠書》和《畿輔安瀾志》的關係問題和著作權問題展開，由此延伸至兩書的版本考證，段玉裁、梁啟超、王國維、胡適等學者皆捲入其中<sup>③</sup>。可以說，水利志書不僅為後世保留與治水活動相關的大量珍貴史料，其修纂過程本身亦構成治水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

1980年代，中國各地區水利志的修纂活動蓬勃興起。1980年4月，中共理論元老胡喬木在中國史學會代表大會上正式呼籲重視地方志的修纂工作，他特別指出：「地方志的編纂也是迫切需要的工作。現在這方面工作還處於停頓狀態，我們要大聲疾呼，予以提倡。要用新的觀點、新的方法、新的材料和新體例，繼續編寫好地方志。」<sup>④</sup>1981年7月，中國地方史志協會（後改名中國地方志協會）成立，標誌着當代中國地方志修纂進入制度化軌道，此後逐漸形成各級地方志委員會和地方史志辦公室等建制化的地方志修纂機構，負責編纂國家規定的省、市（地、州）、縣（縣級市）三級地方志體系。水利作為國民經濟的重要部門，在國家規定的所有省級方志叢書和部分有條件的市、縣級方志叢書中，都有單獨成冊的水利志。截至2012年8月，當代中國各類新編水利志達1,978種、2,074冊，而其中納入國家規定的三級地方志體系的水利志共有1,380冊，佔全部水利志的三分之二<sup>⑤</sup>。

1980年代，水利部門又提出「江河志」之名。1982年6月，國家水利電力部（水電部）在武漢召開全國水利史志編寫工作座談會，提出在五至七年內完成長江、黃河、淮河、海河（包括灤河）、珠江五大江河志的編纂任務，並有計劃地編纂其他江河志。各省、市、區水利專業志的編纂工作也要積極籌備，提出計劃，逐步落實<sup>⑥</sup>。這次會議首次並列提出「江河志」與「水利志」的概念，並強調「水利志不僅屬於地方志的範疇，而且在地方志中應佔有重要位置」<sup>⑦</sup>。此前，中國水利學會水利史研究會已於1982年4月成立，為全國江河志、水利志修纂聚攏了一批行業內力量<sup>⑧</sup>。1983年，各級水利行業開始舉辦水利志修纂講習班，其中方志學家朱士嘉、談瀛，水利史專家姚漢源，文獻學家張舜徽等人在水電部「江河志、水利志講習班」講課，並協助草擬出〈江河志水利志編纂大綱（徵求意見稿）〉；1984年6月，水電部將該部黨組領導的江河水利志研究會作為水利志編修的學術指導機構<sup>⑨</sup>。水利行業的江河志、水利志修纂，由此拉開帷幕。其成果不乏宏編巨製，如黃河水利委員會主持修撰的《黃河志》共十一卷、800萬字，可謂流域水利事業的「百科全書」<sup>⑩</sup>。由此可見，中國當代水利志事實上由兩類志書組成：一是建制化的地方志部門主導修纂、國家規定的三級地方志體系中的水利志，二是水利部門自發主導修纂的各類江河志、水利志。此兩類志書的修纂存在密切而複雜的關係。

中國當代水利志的修纂，不僅為治水水利史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大宗文獻，其本身亦構成當代水利史研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目前學界對於這些問題的探討集中於水利行業內部，多體現於水利史專家為新纂水利志撰寫的有關序言中，多從評價具體作品着眼；史學界未見專門討論者，這或許與史學界貴遠賤近的史料搜索習慣與厚古薄今的研究態度有關。從史學視角出發，圍繞這一主題大抵可以形成兩個方面的研究旨趣，一為文獻學路徑，二為知